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吴国富 编纂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纂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南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吴国富编纂.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11

ISBN 978 - 7 - 210 - 07879 - 1

I. ①新… II. ①吴… III. ①白鹿洞书院 - 介绍

IV. ①G649.299.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9742 号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吴国富 编纂

责任编辑:陈世象

封面设计:章 雷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学术出版中心电话:0791 - 8689833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swwpublic@sina.com web@jxp-ph.com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48

字数:800 千字

ISBN 978 - 7 - 210 - 07879 - 1

赣版权登字—01—2015—80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9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中国古代的书院文化,是了解中国儒学史、科举制度史及中国教育史必须涉及的一个内容。位于江西省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被誉为“天下书院之首”,它具有一套完整的书院建设规制,成为各地书院的模板,同时也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趋势。重新修纂《白鹿洞书院志》,可以为深入研究、合理传承白鹿洞书院文化提供基本文献。

一、再露峥嵘的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开辟于中唐时期的李渤(773—831),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南宋淳熙年间,朱熹重建书院,延续至元末,毁于战火,中断了八十多年。明英宗正统年间,南康知府翟溥福重建书院,此后便一直延续不断,直到清朝末年停办。这一现象,表明白鹿洞书院具有植根于民族历史的合理性。近世以降,中华民族饱受列强侵略之苦,于是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成为风潮,白鹿洞书院也渐渐沦为一处人们凭吊的古迹,失去了生命力。然而,“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既是现代性与科学性的体现,也在很大程度反映了民族的自怨自艾情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抗美援朝结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内外战争,或国家几乎沦亡,或国力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势下,无暇顾及历史,乃至批判传统,自然可以理解。一旦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恢复民族自信心,对待历史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会显得客观而理性。

深入考察白鹿洞书院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即便在内忧外患、政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大多数人对白鹿洞书院的荒废仍抱着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民国九年,江西省省长戚扬在《重修白鹿洞祠宇碑记》中指出:“至于今日,群焉以诈力相高,以亡耻相导,至谓中国古学不适于时用,藉以自盖其荒陋,于此而与谭朱陆之指,义利之辨,真无异猿猱之冠服,爰居之钟鼓矣,可胜忤哉。”吴宗慈在他纂修的《庐

山志》中指出：“爰将唐宋以来兴废因革详著于篇，庶几后之人于毁弃翦灭之余，幸而寝复旧观，相与挹先儒淳固恣实之余风，以救今日支离破碎之士习，岂非生民之大幸乎？”民国政府曾有将白鹿洞书院划归中正大学管理或在这里建造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设想。即便是极力主张打破孔教迷梦、全盘西化的胡适，在参观白鹿洞时也没有什么贬抑之词，反而给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它可以“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在废墟中倔强地挺起身躯，白鹿洞书院也逐渐在荒草中显露头角。1978年，庐山管理局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着手筹划维修白鹿洞书院。1979年，白鹿洞书院文物管理所成立，次年即开始维修白鹿洞书院，到1996年，书院的大部分建筑次第修复，成为一处著名的文化旅游胜地。与此同时，有关朱熹及白鹿洞书院的学术活动蓬勃开展，1988年还成立了旨在恢复书院教育功能的学术机构。近三十年的文化活动，涉及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民间文化团体，由地域向全国乃至海外扩散，由文化高层向大众扩散，还有不少企业也加入了这一合唱。虽然现任白鹿洞书院负责人的黎华先生曾说：“白鹿洞书院的热闹是暂时的，寂寞是永远的。”但毕竟热闹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一百年能消磨一切陈年往事，然而停办一百年的白鹿洞书院却没有销声匿迹，再一次显示它有扎根于民族沃土的合理性。为此，编撰一本资料较完备的《白鹿洞书院志》，也就不是节外生枝的举措。

二、白鹿洞书院的文献整理

一千多年的历史，使白鹿洞书院积淀了内涵丰厚的文化。时至今日，承载书院文化的书面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关书院本身的文献，以《白鹿洞书院志》为代表，附带记载白鹿洞书院的《庐山志》《南康府志》也可以归于这一类；一类是受白鹿洞书院影响而产生的著作，它们产生于书院之外，一般不收入书院志，如清朝王澍的《白鹿洞规条目》等；还有一类是研究白鹿洞书院的著作，如李才栋的《白鹿洞书院史略》等。这三类文献都值得整理，但就目前状况而言，整理得都很不够，即便是作为基本文献的《白鹿洞书院志》，也没有得到修补和完善。

自宋至清，白鹿洞书院都依托于南康府（宋朝称军、元朝称路），由南康府负责提供学田、监督管理诸事。同时，江西省的教育行政长官（如明朝的提学副使、清朝的学道等）也有责任管理书院并给予支持。这种行政管理方式使古代白鹿洞书院得以较好地延续，也使《白鹿洞书院志》得到多次重修、重刻。据《白鹿洞书

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前言,明清两朝的《白鹿洞书院志》共有十一种版本,其中两种由江西提学副使负责纂修,即李梦阳志和郑廷鹄志;其他版本如周伟志、李应升志、廖文英志均由历任南康知府组织纂修。毛德琦志的纂修人毛德琦是星子知县,但实际上他也是在南康府的安排下奉命行事。上述之外的其他版本,基本上属于重印,也由南康府负责。由此可见,省、府两级的共同支持是白鹿洞书院文献得到整理的重要条件。

清朝灭亡以后,南康府的建制撤销了,接管白鹿洞书院的星子县、林业学校及林业部门等均难以胜任整理白鹿洞书院文献之重责。民国时期,对书院文献整理有较大贡献的是学者吴宗慈。他在撰修《庐山志》的同时,整理了不少书院碑刻,收入《庐山志副刊》《庐山诗文金石汇存》等。民国时期,庐山成为“夏都”,住在山上的民国军政要员给吴宗慈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这是他得以顺利整理庐山文献的物质基础。

白鹿洞书院文物管理所成立以后,其上级机构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为其提供了常规经费,使白鹿洞书院的文献整理出现了新的转机。

1989年,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一书出版,该书属于研究和文献整理兼顾的著作。1994年,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选集》出版,该书对书院现存大量碑刻进行了整理。1995年,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点校出版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由中华书局出版(五种古志的撰修者为明代李梦阳、郑廷鹄、周伟、李应升及清代毛德琦)。此外,《白鹿洞书院学报》《中国书院论坛》等刊物的创办,也为书院文献的整理做出了不少贡献。2010年,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组织撰修了《庐山历代诗词全集》,收集上起六朝、下至民国的庐山诗词16500多首,其中白鹿洞书院的诗词有数百首。这些成果的取得,为重修《白鹿洞书院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006年、2007年,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相继成立,地理及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使九江学院积极介入书院文化的研究,开展各项活动。2007年,笔者参与了《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一书的编撰(收入《庐山文化研究丛书》),在编撰过程中,深感重修《白鹿洞书院志》之必要。因为《白鹿洞书院志》自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星子县令毛德琦纂修之后,虽然也有数次重刊补板,却再没有重修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明清各种版本的洞志都显得很不完备:一是康熙以后的史料近乎空白;二是古志所收资料有限,疏漏太多;三是古志修纂受各种因素影响,材料取舍颇有失宜,错误时有发生。近三十年的书院文献整理

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较多局限于书院现存资料,散见于明清文献中的大量资料没有搜集,同时也存在成果分散、流传不广、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在参编《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一书之后,继续搜集白鹿洞书院的文献,努力做到充分利用电子文献及已有成果,编撰了这部《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三、关于《新纂白鹿洞书院志》的编撰体例

明清两朝,《白鹿洞书院志》屡有重修,每位重修者都意图在旧志的基础上踵事增华,郑廷鹄志凡例说:“可因者一遵其旧”,“可并者并”,“可增者增之”,“求其归一,不为苟同”。但古代洞志的修撰,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大致可以概括为“兴儒学、存典章、纪先贤、表功德”四点,也即修志是为了促进书院的兴盛,保存原有的规章制度以便后来者参照实施,追思先贤以继承传统,表彰兴复者的功德以启迪后世。这种目的,决定了古志的编撰体例与材料取舍。首先是有的分类很明确而且相沿不废,如学规、沿革、学田之类,有的分类则很模糊而且不固定,如人物一类,多半以记载名贤为主,洞主次之,诸生很少提及,且三种人物经常混杂在一起;其次是选择材料往往因人而异,或简或繁,很难做到搜罗备至。

本次重修洞志,旨在较为完整地保存书院文化遗产,以供研究和传承之用,因此与古志的修撰目的有所不同。本次重修以“不失旧志之真,突出新志之长”为原则,在体例上充分吸收古志的长处,并基本上与之保持一致,同时为了更清晰地凸显书院文化的各方面内容,编撰时对原有的分类进行认真研究,适当归并,合理增加,力图使每一分类都成为了解书院文化某一方面内容的线索。在材料方面,则尽量做到丰富,凡有关书院本身而不重复的材料,都尽量收入。鉴于1949年至1979年,书院实际上处于荒废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书院得到修复,但进入了另一种不同的活动状态,与古代书院迥然不同,各种文献也无法按古代志书的方式来归类,故而此次修志,时间上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材料不收入。

1.《新纂白鹿洞书院志》的分类

在分类上,《新纂白鹿洞书院志》参考各种旧志的凡例,取其所长,弃其所短,采用了“大体继承,适当增加”的分类方式,试图较为全面地反映白鹿洞书院文化的内容,合理编排入选的材料,相对均衡地安排篇幅。

在五种古志中,李梦阳志的分类是:沿革、形势、建造、石劓、山志、田地塘、文志、书籍、器皿。郑廷鹄志的分类是:山川、书院沿革、名贤、洞祠、洞规、洞牒、文翰、经籍(附器皿)、洞学田、外志。田瑄、周伟志的分类是:沿革、形胜、人物(附经

史子集)、祀典、文志、田地山塘、外志。李应升志的分类是:形胜、沿革、先献(附主洞)、明教、文翰、祀典、田赋、兴洞移札、题词。毛德琦志的分类是:形胜、兴复、沿革、先献、主洞、学规、书籍、艺文、祀典、田赋。

综合考虑分类的必要性、明确性(功能单一、界限分明)、材料配置的相对均衡,《新纂白鹿洞书院志》共设立“沿革”“建筑”“人物”“学规”“讲义”“祀典”“经籍”“学田”“诗歌”“杂纪”十类,篇幅较大的分为两卷。这个分类可以把旧志及新增的内容大体收罗进来。在各卷中,按照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人物、不同时期的事件及诗文等,分为几个部分(相当于各卷中的“纲”),直接统领具体条目,再用具体条目统领原始文献。

(1)沿革:将古志的“沿革”“兴复”归并为一类,仍用“沿革”之名,以不同朝代的书院修建为纲,相关事件及文章为条目,按编年体的方法编录,相关的原始文献放在各个编年纪事的条目之后。纲要大体上以吴宗慈《庐山志》所叙书院沿革为本,随宜增删。

(2)建筑:相当于原有的“建造”类。白鹿洞书院的建筑名目繁多,相关的记载也很多,故单列一类,以不同功能的建筑为纲,分为四大类,以相关文辞为目,集中叙述。另外,建筑部分还附载了“石刻”以及“楹联”两块内容。

(3)人物:旧志原有“人物”“先献”“主洞”等类,载录人物包括对书院有功之人、书院师生、书院祭祀的人物等,分类标准不统一,头绪也不清楚。书院为教学之地,载录人物,当以师生为主,如廖文英说:“书院主盟,学术所系,今遍查碑记故籍,刻其姓氏,以备参考。”(廖文英志凡例)就已经意识到洞主在人物志中应当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本志“人物”卷专门用于记载洞主、师长、诸生,其他人物,如有功之人,则随其事功归类所在,兼带记载;如列入书院祭祀行列之人,则放到祀典类记载;皆不入“师生”类,以免混杂。有关洞主、师长、诸生之文辞,分别载录于各人名目之下。

(4)学规:相当于旧志的“学规”“洞规”“明教”类,载录书院的规章制度、规定性的学习方法等,基本保持原来格局。

(5)讲义:旧志载录了不少讲义,但未作为明确的一大分类,现以“讲义”一类专门收录之,分为宋、明、清三部分。

(6)祀典:古志中“祀典”的分类较为明确,但内容比较单薄,本志采用这一分类,予以充实,将祭祀礼仪、祭祀文辞一并载录于此,分为祭祀人物、礼圣殿祭礼、先贤祭礼、祭器等四个部分。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6

(7) 经籍:古志中有“经籍志”,但所载内容较少,本志将藏书、刻书、编书、修志及相关文辞、书目全部载录于此,以厘清头绪,充实内容。

(8) 学田:将古志中的“田地塘”“洞学田”“田赋”等统一为“学田”类,专门载录学田的兴废史、田租管理及相关文辞。

(9) 诗歌:古志中的“艺文”“文翰”收罗太杂,篇幅太多,分类不明确。廖文英说:“书院之设,本以教士,昭示典训,旧志举洞规、讲义概入文志,本末无等。今特类集先正格言,标为明教,而序、记、诗赋则仍入文翰云。”(廖文英志凡例)已指出其不妥之处。事实上,序记类文章也具有“教士”之功能,与诗赋不同。现将“艺文”“文翰”中的文章分解到上述各类之中,单独析出“诗歌”一类,韵体之赋、铭、联则归入“杂纪”。

(10) 杂纪:杂纪包括赋、铭及游记。游记只选择有裨补缺漏之用的篇章。旧志有“外志”之名目,或用以记载周边名胜,或用以记载方外逸民。第一种内容见于《庐山志》《南康府志》等志书,不必收入洞志,故廖文英志凡例说:“旧志有《外志》一卷,旁及名胜,详载郡志,弗录。”今从之。第二种内容事关白鹿洞书院,但思想上属于佛道两家,归入上述各类则有违书院的儒学本位,一并舍弃则难免疏漏,故郑廷鹄志凡例云:“本洞以道德性命之学启迪诸生,一切干名嗜进之说,尽当屏斥。其方外逸民之事,悉入《外志》。”今将属于“外志”性质的条文归并为一题,附载于游记之后。

2. 材料的取舍与编订

(1) 材料的取舍。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在材料搜集方面务求繁富,凡目力所及,皆存以备。各种版本的古志及古志之外所见资料(时间下限为1949年),原则上皆收入本志,实际取舍则有一定的原则。郑廷鹄志凡例说:“其间有兼言他事者,不必尽载,或别柬、别记有可截取者,录其节文,事竟而止。”为此本次重修洞志的材料选用原则也是“事关鹿洞、事竟而止”。反映白鹿洞本身包括人物、事件、建筑、教学等方面的材料,一般均予收录;不涉及书院本身者,如对白鹿洞书院的仿效、评价、研究等,一般不收入本志。游记类文章,也要求“事关鹿洞”,不相关以及重复叙述的游记,也不收录。基于“事竟而止”的原则,旧志脱漏的事实人物,作为搜集增补的重点。有些事实人物材料比较繁富,重复叙述较多,则酌情予以删减。有不少文章在记事之时也发表了一些对书院或儒学的评议,为保持文章的完整性,一般予以保留,过于繁冗或缺少思想价值的,则酌情删节。

关于洞志收录白鹿洞书院诗赋的问题,前人有两种意见。郑廷鹄志凡例说:“其诸贤足迹所临,而留题其间,或向往所在,形之寄赠,其为仰止白鹿一也,搜访书之。其搜访所不及,以俟后之君子。”廖文英志凡例则说:“名家歌咏,剺刻几遍,宁简毋滥,敢辞罪我。”廖文英从文学角度出发,认为书院诗赋庸滥者多,不宜尽载;郑廷鹄则认为“洞牒所不能尽,故继之以文翰、经籍”,且“其为仰止白鹿一也”,故而遍加搜访,尽行载录。综观白鹿洞的诗赋,或歌咏先贤,或阐述教化,或借山水明理,一般不以文学见长,但大多数与书院教育有关,所以郑廷鹄的意见有理,本志基本上遵从之。

基于“事关鹿洞”的原则,无关鹿洞之材料理当删除,对待旧志也是如此。如毛德琦志中叙述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生平事迹的篇章约有 8000 字,本志删除二程、张载的部分,增补了开山洞主李渤的传记。又如邵宝的《品士亭记》、蒋国祥的《重建二贤祠记》,亦与白鹿洞无关。旧志中还有 22 首歌咏鹿洞之外山水名胜的诗,也一并删除。

郑廷鹄志凡例说:“本洞以道德性命之学,启迪诸生,一切干名嗜进之说,尽当屏斥。”受到官场习气的影响,古志中有一些歌功颂德、自我吹嘘的诗文,自然应当删除。如周颐的《圣寿无疆颂》,是一篇与鹿洞无关的谀辞;毛德琦志中有 28 首诗是给毛德琦捧场的。这些均无收录价值,一并删除。廖文英志凡例说:“讲说剺腐,公移繁冗者删,庶免厌观。”这一意见也有道理,不过删节时须持谨慎态度,大抵公文之言之有物者、讲义之言之有理者,还必须保留。李应升志及毛德琦志中收录了 21 篇蔡士英、李长春的公函文牍,冗滥可厌,本志进行大幅度删节。另外郑廷鹄、葛寅亮等人的讲义见解有限,篇幅冗长,本志也酌情进行删节。旧志详载学田的清单,以备清田之用。本志保留了最详细的一份清单,即毛德琦志所载的田亩清册。总计上述各项,从古志中剔除者有一万余字。除此之外的古志内容,均予以保留。

就字数而言,《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收入五种洞志,每种约有 10 万字(其中毛志稍多,接近 12 万字)。而《新纂白鹿洞书院志》总字数接近 60 万,相当于每种古志的 4 至 5 倍。《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从《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采入各类文章 272 篇、诗歌 485 首、对联 29 幅、石刻 54 条、人物 136 个,新增补文章 197 篇、诗歌 348 首、对联 20 幅、石刻 39 条、人物 175 个(其中非师生类人物 10 个)。总计载录文章 469 篇、诗歌 833 篇、对联 49 幅、石刻 93 条、人物 311 个。其他零星材料不计在内。

新纂白鹿洞书院志

8

(2) 文字的处理。

修志不同于资料汇编或古籍整理,故必须对入选材料进行处理。书院存有大量碑刻,其正文部分一般均采入本志。脱漏太多、无法通读的段落,则酌情进行删节。郑廷鹄志凡例:“《旧志》偶误,今有所据,即为删定,不为疑辞。”“旧志所阙,或石剝所蚀,今不可读者,悉作阙文,不敢擅为增减,以备传疑之法。”这种方法只适合脱漏较少的段落,大部分不可卒读的段落则没有必要保留。篆额及落款中过于繁冗的官衔亦予以删减。碑刻附载学生姓名,大部分不予登录,有参考价值的则放在脚注中加以说明。有些层层批转形式的公文,不便阅读,酌情予以改写。除个别明显的错字、避讳字之外,不做文字上的改动。古志记载学田亩数,采用大写数字“壹、贰、叁……”以免他人随意篡改,本志一律处理成中文数字“一、二、三……”

(3) 文献的征引。

本志主体资料采自《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又采用廖文英《白鹿洞书院志》,统一据《四库存目丛书》史部 246 册(齐鲁书社 2002 年出版),加上新增材料,其来源出处均在脚注中标明,不另列参考书目。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碑刻摩崖选集》对现存碑刻作了整理,本志将该书作为参考文献之一,落实到具体文章时,仍根据碑刻核对原文。

(4) 史实的考订。

郑廷鹄志凡例说:“《旧志》偶误,今有所据,即为删定,不为疑辞。”毛德琦志凡例说:“祀典一条,止仍旧刻,未敢赘论。”两者相较,郑廷鹄的看法较为合理。本志尽力对材料加以考订,或以按语的形式放在材料后面,或以短篇的形式出现。考订范围包括:现有材料不足以清晰反映但又较为重要的事实人物;现有材料存在讹误之处,参考其他材料亦不足以正其误者;现有材料记载零散又须集中了解的重要事实。这些考订均作为案语放在相关内容之后。

凡 例

一、本志分为十大门类:沿革、建筑、人物、学规、讲义、祀典、经籍、学田、诗歌、杂纪。每一类为一卷,其中沿革、建筑、人物、诗歌各分上下,共十四卷。

二、每卷分为一至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单列标题,其中大部分包含若干条目,均加上括号,以示醒目。与各个条目相关的文献均附着于条目之后。

三、设置条目的方式:“沿革”及“学田”的“置田清理”部分以编年纪事为条目;“建筑”类以建筑物名称为条目;“人物”以人物姓名为条目;“祀典”“经籍”及“学田”的“理租”部分以事务的不同内容为条目;“学规”“讲义”“诗歌”“杂纪”只分为若干部分,不设条目。

四、小序:每卷开端(不包括分为上下卷的下卷)均冠以小序;各卷每部分开头均冠以小序,简要说明分类标准及内容特点等。

五、编者之考订辨析,均作为案语,附着于相关内容之后。

六、为保持文风统一,本志正文中编者的撰述文字均使用浅近文言。

七、本志所用文献,均在脚注中标明来历。来自于白鹿洞书院现存碑刻的文章,其来历简称为“书院碑刻”。

八、编入本志的文献,一般保留原样,少量予以删节,但不改动文字。

目 录

前言	1	1
凡例	1	
卷一 沿革上	1	
形胜	2	
唐 五代 北宋	3	
南宋	8	
元朝	29	
明朝	31	
卷二 沿革下	53	
清朝	54	
民国	90	
卷三 建筑上	101	
殿祠门坊	102	
堂阁馆舍	116	
卷四 建筑下	129	
亭台	130	
桥	148	
石刻	155	
楹联	161	

卷五 人物上	171
洞主	172
卷六 人物下	223
师长	224
诸生	238
卷七 学规	253
宋明学规	254
清代学规	274
卷八 讲义	293
宋代讲义	294
明代讲义	302
清代讲义	328
卷九 祀典	339
崇祀人物	341
礼圣殿祭礼	346
先贤祭礼	354
祭器、供器、什器	364
卷十 经籍	367
藏书、刻书	368

编撰	378
修志	385
卷十一 学田	403
置田、清理	404
理租	459
卷十二 诗歌上	465
唐宋元诗歌	466
明代诗歌	484
卷十三 诗歌下	625
清代诗歌	626
民国诗歌	699
卷十四 杂纪	711
赋、铭	712
游记	726
后记	752

卷一

沿革上

鹿洞千年,兴废不一,统谓之沿革。序之以朝代年号,以示其先后也;叙历年之大事,以见鹿洞之兴衰也;附之以文牒,可见其翔实也。大略言之,开辟于唐代之李渤,肇始于南唐之国学,此白鹿洞之肇基也;朱熹兴复之而规制完备,翟守重建之而道统流传;此白鹿洞之再造也;嘉定时师徒云从,嘉靖时诸生盈溢,此白鹿洞之鼎盛也;康乾以降,功名之心弥漫,宋明之风不存,此白鹿洞之衰变也。然所谓纪事者,纪白鹿洞书院兴复之大事也,今以吴宗慈《庐山志》所述为本^①,杂参古志及他书而编订之;此外如树亭建桥、置办庄田,则别有卷目详载,本卷略陈梗概而已。

形 胜

大江之西,豫章为一大都会,夙称文献。其山自五岭、大庾、武功而来,会于匡庐。其水自章、贡、盱、汝而来,会于彭蠡、匡庐。彭蠡奇秀,甲于西江,而白鹿书院又匡庐、彭蠡之最胜也。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三山环抱,曰后屏、卓尔、左翼;一水贯之,曰贯道溪。其地乃天造地设,其名则后出焉,大抵皆起于明代也。

五老峰 五老峰在庐山东南,五峰耸峙,壁立万仞,苍颜翠面,云霞掩映,如人正襟危坐然。自下观之,势如并立,自上观之,相距甚远。巉岩壁立,上冲霄汉,如

^① 吴宗慈编撰、胡迎建注释:《庐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